

# 曹德旺先生办大学的标本意义

王一涛

曹德旺先生拟捐巨资创办福耀科技大学，目前已处于土地征迁阶段。在笔者看来，福耀科技大学作为一所由知名企业家主导创办的高水平民办高校，在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中将具有重要的标本价值。

我国向来有慈善办学的传统，但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民办高校多是投资办学而非捐资办学，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企业家的财富积累不足，难以短时拿出大笔资金兴办大学。民办高校投资办学的基本特征决定了我国绝大多数民办高校发展受限、难以跻身高水平大学之列。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捐赠文化蔚然成风，有能力并且有意愿捐资办大学的贤能志士越来越多，这就为高水平民办高校的建立提供了基础性的社会条件。

西湖大学可视为我国第一所高水平的民办大学，西湖大学由施一公等科学家牵头创办，科学家本身并无资金，他们通过向企业家和政府募捐的方式创办起来。相比之下，福耀科技大学由资金雄厚的知名企业和企业家牵头发起，在举办主体上与西湖大学存在区别。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社会资金日益聚集的今天，资金雄厚的企业捐资创办非营利性的高水平民办高校，可能成为推动我国民办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福耀科技大学更具有标本意义。

韩国的浦项科技大学是由韩国浦项制铁公司创办的一所私立高校，成立于1986年，与我国很多民办高校的成立时

间大体相当。这所由企业所创办的私立高校在不到40年的时间内，以“提供最好的教育，进行最尖端的科学研究，服务国家乃至全世界”为其办学理念，如今已发展成为世界顶尖的研究导向型科技大学，位列2022年QS世界大学排名第81名。根据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韩国浦项制铁公司位居171位，利润为1556.1万美元。在同年的排行榜上，中国宝武钢铁集团位居149位，利润为2168.2万美元；江苏钢铁集团位居340位，利润为1869.2万美元。可以看出，浦项制铁公司的利润其实低于我国的很多民营企业（江苏钢铁集团就是一家总部位于苏州的民营钢铁企业）。浦项制铁公司能够创办出一所位居全球前列的私立高校，为我国民营企业举办民办高校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曹德旺先生所创办的福耀科技大学，就是我国知名企业和企业家创办高水平民办高校的宝贵尝试。

在福耀科技大学之前，我国也不乏知名企业创办民办高校的先例，比如，茅台集团举办了茅台学院，吉利集团创办了三亚学院等多所民办高校。但企业并没有向民办高校投入巨额资金，企业的资金优势并没有转化为民办高校的办学资源优势，这些民办高校依然处于“以养学学”的状态。

为了创办福耀科技大学，曹德旺先生已准备投入100亿元建校，未来如果需要，他还将再次投入，和第一期剩余额的资金凑出100亿元设立奖励基金。雄厚的资金有望为创办高水平民办高校奠定了基础。但是，福耀科技大学能否实现既定的办学目标，首先需要解决两个

关键问题。

第一，能否尽快提高办学层次。我国很多民办高校在创办之初也曾雄心勃勃，也希望能走高水平甚至是研究型高校的发展道路。苏州市一所民办高校在创办之初准备参考香港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办一所研究型高校，但是学校连升格为本科院校的目标都未实现；学校在升本受挫后，无奈调整了发展目标和办学模式，开始培养职业技术人才。曹德旺最初曾设想让福耀科技大学直接从硕士生研究生开始招生，他也多次流露出希望借鉴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办学模式，德国部分应用科学大学是具有博士学位资格的。理论上说，每一层次的高校都可以办成高水平的高校，但实际上，办学层次基本上决定了一所高校吸纳资源的能力，高职院校所能够吸收的资源比不上本科高校，本科院校吸收的资源不如硕士生层次高校，硕士生层次高校比不上博士生层次院校。生源和师资是大学最重要的两种资源，假如福耀科技大学只能办本科，要想从全国吸引最优秀的生源和从全球吸引最优秀的师资将会非常困难。而我国硕博点授予权需要层层审批，竞争激烈。南方科技大学2007年开始筹建，2018年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点，11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这一速度是相当快的。作为一所公办高校，南科大是在深圳市大力支持下实现该速度的。能否尽快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既取决于福耀科技大学自身的准备情况，更取决于教育部能否给予该校足够的创新突破空间。

第二，能否适当控制在生和学科专业规模。浦项科技大学在校生成规模

3000人左右，美国的欧林工学院只设置了电气和计算机工程、机械工程、生物工程、工程设计和工程机器人等方向。从媒体报道来看，福耀科技大学计划在2033年达到在校生12000人规模。这个体量在我国高校中算是中等偏下的规模，但是，对于一所希望达到高水平的民办高校而言，这个规模还是略大了。除了曹德旺先生投入的100多亿资金之外，福建省将提供100亿建校资金，福州市每年会提供5亿元扶持资金。这些资金即使全部到位也并不算多。2021年75所教育部属高校中，有13所生均经费预算超百亿元。因此，要提高福耀科技大学资金投入的产出质量，必须控制在招生规模和学科专业布局，建成一所“小而美”“小而强”的大学。只有控制在招生规模，才能提高生均可用的教育经费，生均教育经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一流大学的生均经费都很高。只有控制学科专业布局，将资金持续投放于最可能突破的前沿领域，才有可能在教学和科研等方面取得边际突破。控制规模要求福耀科技大学富有前瞻性地做好战略规划，自觉抵制规模诱惑，有所为有所不为，把握国家和世界科技发展潮流，紧密结合自身资源禀赋，精心筛选，凝练主攻方向，“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在这方面，欧林工学院的做法也值得借鉴，为减少人文社科缺乏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影响，该校巧妙借用其他高校资源，让学生选修毗邻高校的人文类课程，这样欧林就可以在理工科领域集中发力，实现边际创新。

（作者系苏州大学东吴智库研究员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本文为中国民办教育协会2021年度重点课题“高水平民办高校建设研究”的成果之一。）



九岭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江西省靖安县境内，森林覆盖率达到97.82%。如今，一群默默无闻的青年人守护着这片一望无际的林海，与青山为伴的他们称自己是同龄人中的“青山后浪”，“90后”邹鸿堰就是其中的一员。

2019年，在九岭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做护林员的邹鸿堰成功获得世界自然基金会环境教育注册讲师资格，成为保护区里的自然教育工作者。从此，她将保护区里的花鸟鱼虫、山山水水制作成课件，带着孩子们通过沉浸式的观察，学习自然知识。“别看他们都是大山里的孩子，但有些孩子一放学就去刷视频、玩游戏。他们的家离自然很近，心却离自然很远。希望孩子们能够真正亲近自然，感受自然，读懂自然，从小培养爱护环境，尊重自然的意识。”邹鸿堰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邹鸿堰已经在保护区内开展了近百场自然教育实践课活动，覆盖靖安县12所乡村学校、2000多名学生。“只有让他们真正见识了自然的美好，才会自觉地加入到保护这片林海队伍中来。”邹鸿堰说。

图为在江西九岭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邹鸿堰带着孩子们观察植物。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 校外教育培训治理需要“疏”“堵”结合

### 校外培训治理不能“一关了之”

薛二勇

校外培训需求激增的背后，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质是广大学生及其家长的高质量教育需求不能有效地得到满足。因此，校外教育培训治理不能“一关了之”，在推进校外教育培训健康发展的同时，关键是改革学校教育结构，理顺教育服务的供需关系，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

减轻学生负担，对学校教育、校外教育的双向治理本身体现了学生减负的复杂性，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规范校外教育培训行为的同时将大部分教育需求转移至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利用延时服务等方式为学生提供额外教育。

做好学校课后延时教育服务，坚持以满足不同学生学习需求为导向，丰富服务的内容、形式和手段，制定服务质量的监测和评估机制，构建课后延时教育服务开展的标准体系，促进课后延时教育服务的健康发展，让学生能够在校内学足学好。提高教师课后延时服务补助标准，增强学校的柔性化、人性化管理水平，提升课后延时服务质量，避免额外增加学校教师的工作负担；可通过招募志愿者、校外专业人才及具有专业资质的社会力量参与课后延时服务等形式，弥补师资力量不足。深度挖掘学校教育服务供给中的岗位需求，打通校内校外教育岗位资源壁垒，制定标准，加强管理，采用临时聘用、购买服务等方式，让获得教师资格证书的校外培训机构教师进入学校就业，开展课后服务、假期托管等工作，提供就业岗位的同时，减轻学校教师的课后教育服务负担。测算课后延时服务成本，完善政府支持方式，确定课后延时服务的家长分担比例和收费标准，建立公正合理的课后延时服务成本分担机制。有条件的地区也可以考虑引进校外教育培训机构，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提升供给的质量。办好高质量的学校教育，提供高质量的学校课后延时服务，以更好地满足家长、学生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

校外教育培训治理应当准确把握治

理理念，校外教育培训不仅仅需要干预，更重要的是引导和推动行为规范化。树立疏堵结合、变堵为疏的治理理念、形成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加强政策执行的监测评估，提升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通过系统监管、购买服务等方式将校外教育培训系统纳入教育体系。对困难家庭子女提供更多公益性质的课外学习和文化活动的机会，引导和鼓励校外培训机构为需要课后辅导但家庭经济落后的学生提供帮助。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不同学校学生的具体需求，针对处境不利学生提供可行可信的课后辅导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有关要求，尽快建立基于社区、服务每个家庭的家庭教育指导体系，尽快建设职业道德高、业务能力强、服务意识好的家庭教育指导队伍，针对不同家庭教育的具体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指导，解决家庭教育的困惑，提升家庭教育质量。以家庭接受的方式，灵活有效传播“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的教育理念，塑造缓解教育焦虑的舆论环境。

治理校外教育培训，最关键的是明确功能定位，让校外培训机构回归到教育补充者的角色上，推进校内外协同育人。校外教育培训以满足学生发展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为目的，不能超前、超量进行培训，其功能定位主要为三个方面，即补弱、补超、补特。一是重点发挥其补弱的功能，对于学校教育的“后进生”，应首先满足其学习进步的需求，通过补偿性教育补习学生在学校未学会的内容；二是发挥补超的功能，通过科学有效的甄别手段，满足智力超常学生的特殊教育需求，扩充教育培训的范围和深度，提升学生的知识见识和思维品质；三是补特，满足不同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发展的需求，培养学生音乐、体育、美术、艺术等不同方面的特殊才能。建立健全校外教育培训治理的政策体系，细化政策规定，推进校外教育培训的科学发展。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应基于地区发展实际和需求、学生群体特点和基础、教育实际条件和能力等，形成个性而有质量的教育体系，以区域

为特点，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学校(寄宿制学校、非寄宿制学校)采取不同的推进模式；形成校内外协同治理的新格局，切实考虑城市、农村教师、家长的实际需求，采取不同的政策落实方式。

加强监测，建立校外教育培训行业协会(或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质量监测，设立全面、科学、合理的认证和监测指标，既符合公共利益、又满足校外培训机构自身需求。一是明确职责，在监管的过程中充分利用行业协会的力量，使监管更加高效、治理更加精准。校外教育培训行业协会的主要职责为资质认证与审查，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认证，内容包括教育合理性、师生安全保障、个人信息保护、从业人员培训、以及是否遵循自律等。二是进行认证，制定严格的认证流程，包括递交申请书、现场勘查和文书检查等，通过全部审查的校外教育培训者获得认证标志。根据校外教育培训行业发展状况，规定认证有效期限，过期须重新申请审查。校外教育培训行业协会对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进行认证，设计从业者道德、知识、能力和技术评价体系，评价合格后授予相应认定证书。从业者认证共分为若干级别，被考核者须按照从低级到高级的顺序参加考核，考核内容难度及标准随相应等级的提高而攀升，作为其专业发展、待遇提升的重要依据；同时，为维护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的劳动权益，对校外培训机构雇佣关系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如发现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违反法律法规或相关认证制度，可视情况对其做出勒令整改、撤销认证标志的处罚决定。三是行业自律，校外教育培训行业协会制定行为准则，对校外教育培训经营行为作出规范，对校外教育培训讲授内容、授课形式、费用收取、人员聘用等进行监督。校外教育培训行业协会制定校外教育培训安全标准、信息保护指南，保护信息安全。监督保护学生上下课途中的人身安全、提升教职员工安全素养、为学生提供安全的教育培训环境，对校外培训机构提出明确要求、具体建议。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

教育培训机构关闭，首当其冲影响的是家长预付的高额学费，部分家长表示课时费用难以退回。表面来看，家长因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关闭而无法获得学费退款这一现象是由“双减”政策实施直接造成的，实际上，其根本原因在于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为实现资本化运作滥用预付费模式，为扩大业务范围提前转移学费挪作他用；为了增加客户粘性，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利用阶梯优惠方式诱导家长签订长期培训协议并支付高额培训费用。如果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发生资金链断裂，则会造成家长集中退还学费时出现履约困难的问题。此外，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迅速关停，学校教育不能满足教育需求的情况下，家长补课需求处于“真空”地带，于是造成了“变相补课”。

在学校教育服务的调整和优化时期，家长原有的教育需求转移至学校教育服务，需要一定的

机构大规模的资金来往、尤其是经费支出，及时冻结风险账户，严防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转移资产、卷款跑路、转移学费、拖欠工资等情况的产生。以多种媒体方式和技术手段公告阶段性或终结性的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监察结果，以供利益相关者采取适当行动，维护合法权益；引导家长和校外教育培训机构采用协商、仲裁、诉讼等方式解决学费退还问题，降低由此产生的群体性社会风险。

建立引导家长科学认识、理性选择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机制。中央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联合建设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实现“一网通”的建立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核查机制，对教育培训的业务范围、行业资质、从业人员、教育模式等面向社会公布，便于家长选择合适的培训机构。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平台中，基于学科、领域、层次、业务等类别区分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行为，

## 健全风险预警干预机制

李健

部分家长存在刚性的“基本补课需求”，针对学力较弱的后进生，需要在课堂教学之外进行补课，以保证基本的教育教学质量、保障孩子的学习进度。部分家长存在强烈的“赶超补课需求”，针对学力较强的优优生，家长为了让孩子在升学考试中表现更加优异、超越同伴而进行补课。在考试招生选拔制度没有根本性变化、家长的教育理念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的环境中，学校无法补课且校外无处补课的情况下，家长产生了新的教育焦虑，导致家政补课、一对一补课、转换场所补课、家庭联合式补课等现象的产生。

为此，应尽快建立健全校外教育培训风险预警干预机制。以区县为单位，对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运营、债务、服务对象等情况进行系统排查，对于可能出现的关停风险，通过传统媒体、现代媒体、监管平台向社会发布预警信息；对于正在出现的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关停行为，政府有关部门发现即介入，监管其财务变化、经费支出、资金流动、债务清偿活动，优先退还家长所交培训费用；对于已经关停但未退还家长所交学费的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对其负责人进行经济、税务、诚信、消费状况进行调查，如果确认存在转移资金、隐瞒资金、恶意欠债、拒不退费等行为，根据法律有关规定进行严厉处罚。

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渠道，以反映问题的特定家长数量、涉及金额、影响程度等，启动预警干预机制。政府调查期间，由金融、银行、公安等部门建立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经费使用和支出监管机制，禁止校外教育培训

设立科学的搜索方式，便于有校外教育培训需求的家长和学生选择合适的教育培训机构。实时发布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监测结果，公布违规教育培训行为，避免利益相关者的损失。在学校、社区、政府部门建立监测网络，健全违规培训行为反馈渠道，构建市民热线、举报电话、举报邮箱、交互软件等相结合的全方位举报通道，坚决查处教育培训机构违规一对一、进入家庭、组织小班、高端家政等行为，从经济上加重处罚力度，向社会公开违规教育培训行为，将违规行为处罚计入教育培训机构信用体系，大幅度增加违规培训行为成本。

加大公益性学习支撑体系建设，满足多样化个性化学习需求。在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加强公益性学习平台、渠道、数据库的建设。一是针对学生的学科性知识复习巩固的需求，有效整合全国的优质教师教学资源，建设优质教学支撑体系，使每一位学生都有机会接受优质教育资源；二是针对学生的学科性知识加深提高的需求，科学结合学科教育专家、心理专业人员进行思维训练等，提供拓展性的学习资源，提升学生的知识和能力水平；三是针对学生的学科性知识补习的需求，结合国家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教材编排的关键内容和基本要求，提供补充性的学习资源，使学生能够跟上并理解所在学校的教学进度；四是针对学生的非学科性知识学习的需求，根据有关领域的发展状况、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提供丰富多样的学习资源，通过公益性学习资源体系，满足学生的个性化教育需求。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